

第七章 結 論

本文題目是「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兩岸談判：辜汪會談個案分析」。若論文撰寫是理論建構的過程與鵠的。則就理論科學功能而言，本文第三章辜汪會談與兩岸談判應具有全文整體的「描述性」功用。本文主體結構由兩個理論（系統論、Habeb 理論）來指導章節安排。「系統論」作為背景理論（background theory）以為，任何理論建構或政治現象都無法避免系統外因的互動與衝擊，在這理論意涵下，形成第四章的辜汪會談內外因素，並且第四章的內在因素是本文探討「一個中國爭議」的形成基礎與淵源。其次，本文的「不對稱權力概念」引自 Habeb 理論，因此也以 Habeb 對權力（power）的分類架構，形成第五章的議題爭議與第六章的策略分析，並且第五章第六章的意義在於，關於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台灣只有從「議題權力結構」與「談判策略」的操作面向，或有可能扳回與緩和兩岸權力不對稱劣勢之不利。本文從「辜汪會談」的角度切入，探討小國與大國的相處之道，亦即台灣應如何面對崛起的中國（rising China）。

本文研究動機緣於台灣早期的「反共必勝、暴政必亡」到廿世紀晚期的「中國崩潰論」，其預測及論述與現實的「中國崛起論」並不相符，且對緩解「台海衝突論」毫無意義。社會科學研究總是反應時代現實，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理論層面的探討以及時代精神的反省。本文以辜汪會談為切入點並研究九〇年代以來「台海衝突論」的癥結「一個中國爭議」，論述台灣政策氛圍的集體心態調整與柔水哲學的生存觀點。本文探討兩岸潛在衝突性的解決之道並理性化台灣的最大國家利益。本文理論基礎的「柔水哲學/Habeb 理論」的實質內涵有兩層，一是集體心態上的不與強國爭勝，寧願「裡子」甚於「面子」或「裡子」與「面子」的平衡，二是政策面向的彈性與柔軟，總括其為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的中心概念。這在突顯其與九〇年代以來，台灣面對兩岸關係的僵持無解與「鎖國心態」形成兩者之間在理念上的鮮明對比。本章以三個節項（本文結論的型模分析、柔水哲學/Habeb 理論的理念闡述、理論主張檢驗）來鋪陳本文結論與相關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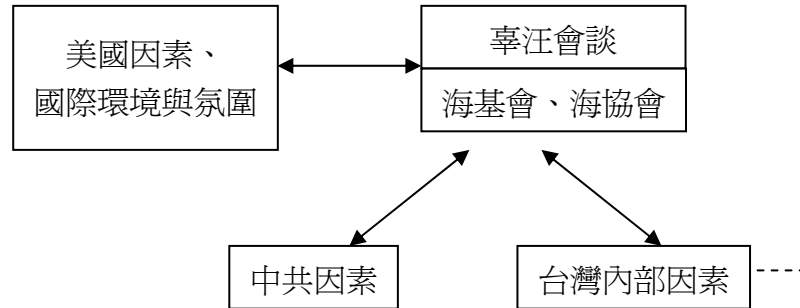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本文結論的型模分析

本節將模擬與借用第四章第四節的模型（conceptual model）以為全文的解釋與探討架構，並且歸納第四、五、六章的論點來共同闡釋下圖 7-1-1。該圖由三部份組成但該三部份並沒有直接關係，卻參與解釋本文「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兩岸談判：辜汪會談個案分析」，並且勾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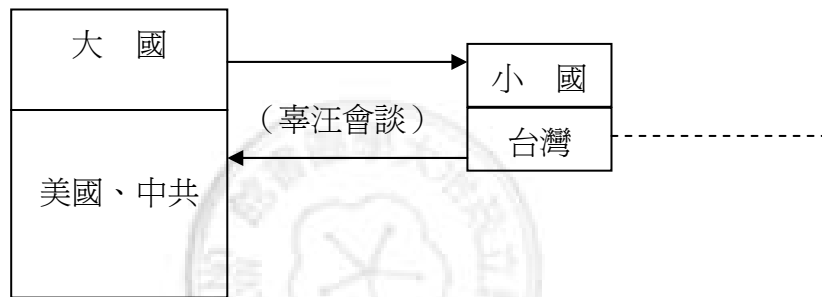
全文研究的大致輪廓。

圖 7-1-1 本文結論的解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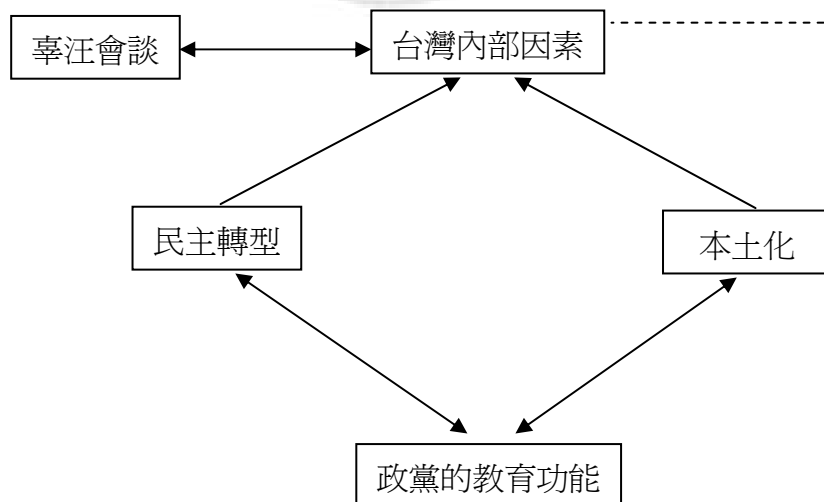
(一) 辜汪會談環境因素



(二) 不對稱談判態勢



(三) 台灣內部因素的形成結構



實線：表示實質影響與互動

虛線：表示台灣因素的同—性 (isomorphism)

資料來源：自作整理

基本上，此圖有幾個意義與假設 (hypothesis)：(1) 辜汪會談在臺灣所面對的國內外形勢、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國際權力結構反應等層面上，並非是主導變數 (dominant variable) 反而是各相關變數的因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是以美國呼籲兩岸對話以維區域穩定。因此，本文研究以辜汪會談個案分析鑲嵌於兩岸關係的研究系絡，亦即辜汪會談的「議題爭議」與「策略運用」需從「談判桌」之外的兩岸互動或其他因素，尋求變動原由與緣起原委；(2) 由於大國間的區域權力平衡或責任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考量，將影響兩岸談判、兩岸關係或區域和平與穩定，相較於大國的相對「超穩定」結構，是以台灣內部因素的本土化意識與民主轉型，隱然成為「小國大影響」的主導變數；(3) 台灣內部因素的形成要素除化為「民主轉型」與「本土化」之外，就圖例 (二) 不對稱談判態勢而言，台灣的內部因素也受到國際環境與「中共因素」的辯證性 (dialectical) 影響，亦即「民主轉型」與「本土化」的擴張性或非理性成份必受到「中共因素」與「美國因素」的不對等共同制約；(4) 不論是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台灣都面對兩階段 (two-level game) 的環境因素限制。因此，本文主張「柔水哲學 / Habeeb 理論」能夠處理「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辯證性與同時性 (simultaneously) 以及兩者間的互為迴旋空間。然而，此種既定的結構特色，「國內因素」表現為「核准機制」與「民情輿論壓力」而「國際因素」主要是「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並且「美國因素」與「中共因素」又具有區域性或全球性的霸國權力對局 (game) 特性。因此，本圖例中的任一組雙重對局 (two-level game) 都只是整體結構的某個單獨面向 (single-dimension) 而已，而整體結構則是由數個「雙重對局」所組成；(5) 圖 7-1-1 是由各實證性的相關變數 (variables) 所型構的概念模型。因此，其所對應 (correspondent) 的研究章節應屬「實證研究」範疇，而本文「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則具有「規範性」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本文的實證研究隱然可推導出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具有多階雙重對局 (multip-two-level game) 的權力結構特色，但這是本文理論意涵之外以及研究論述所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本文理論基礎主張，台灣的生存之道或應對之方，當調整柔性心態與彈性策略來化解「台海衝突論」的僵局與緊張，這是具有規範研究特色的。

就上述第 (1) 點而言，「辜汪會談」的本質是「兩岸談判」也是兩岸關係的反映與測試平台。辜汪會談的歷史角色在反映兩岸關係互動並測試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與方向。基於兩岸公權力的僵持與對峙或許只有將「辜汪會談」放進兩岸關係的研究脈絡，或有可能解開「談判桌」僵局及兩岸關係緊張對峙的緩解線索。台灣在辜汪會談或兩岸談判的策略應用是國內政治的映象 (reflection) 與延伸，以及國家領導

人在「內外環境因素」之下的綜合反應 (complex reaction)。辜汪會談的台灣策略必是國內政治的延伸，且其談判策略的整體結構注定兩岸談判僵局的到來與「政冷經熱」格局的必然。不論是「辜汪會談」或其他兩岸談判，其談判策略必植基於一定的政治文化根源。在台灣方面，這是「民主化」與「本土化」政治運動的滋生環境。就談判過程而言，「辜汪會談」能順利舉行是因雙方在口頭上或「象徵意義」上，達成一個承諾 (commitment) 即「一中」歧義的相互尊重與會談的對等與和諧。另一方面，「辜汪會談」在「擱置政治爭議」的基礎下能順利舉行，表示雙方已達成某種備選方案 (alternative) 的平衡，或達致雙方互可接受的某種妥協立場，此即「一中各表」的精義與重要性。這是因雙方在「一中爭議」僵持不下，退而求其次「雖不滿意但仍可接受」的備選方案或「次佳」選擇。從對局理論 (Game theory) 觀點而言，由於台海兩岸在既定的「不信任結構」¹ 與「國內外環境因素」制約下，一時無法採取「最佳方案」來建構互惠性的國家利益，只好退而求其次採取「次佳方案」以避免更壞結果或最壞結果的產生。

就上述第 (2) 點有關民主轉型與本土化的型構要素而言，雖然台灣「民主轉型」與「本土化」及其相關作用與社會現象，多數學者的探討大都從台灣威權體制轉化、蔣經國個人因素、歷史恩怨與傷痕、反對勢力歷史背景甚至國際因素第三波民主化來說明與解釋之，然而本文主要關注廿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轉型」與「本土化」對辜汪會談或兩岸談判所造成的影響及其對談判議題與談判策略的制約。且台灣的「內在因素」其功能也部份解釋第五章 (辜汪會談的議題爭議) 與第六章 (辜汪會談的策略分析) 的內涵，亦即台灣的內在因素說明與解釋「辜汪會談議題爭議」與「辜汪會談策略分析」之中，有關台灣的行為取向與預圖模式之主要背景與型塑基礎。「辜汪會談」雖然圓滿落幕，但從事後結果而言，兩岸是以僵局無解收場，且「辜汪會談」所擱置的「實質分歧」逐漸蘊釀並擴大成一九九六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以及「後辜汪會談」時代，十餘年來「政冷經熱」的兩岸格局。事實上，只有從台灣的「內部因素」方足以理解與詮釋下列諸問題，如「辜汪會談」能舉行的島內氛圍與蘊釀背景為何？何以「國統綱領」近程規劃下的「辜

1 張亞中教授指出，二〇〇二年的「一邊一國」論，讓兩岸關係正式跌到谷底。中共高層對陳水扁的「聽其言、觀其行」正式結束，認定陳水扁走「台獨」路線。兩岸關係已形成「不信任」結構。請參閱 **中國時報**，93年4月24日，版6。

汪會談」相對於中共的談判作為顯得保守？台灣的談判代理人 (agent) 為何發生機關間的權責衝突？兩岸的談判協商為何卡在僵局而無法解決？基本上，台灣的「內部因素」是台灣能產生「小國家大影響」的關鍵要件。本文是以「政黨的教育功能」為台灣內部因素的驅動要因。雖然影響與型塑台灣內部因素的結構應是多元共振 (resonance) 與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依蓋洛普 (Gallup) 1989 到 1994 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強烈贊成」和「贊成」台灣應該獨立的比例，從 8.2% (1989 年 12 月) 到 12% (1990 年 12 月)，12.7% (1991 年 6 月)，15.1% (1992 年 10 月)，23.7 (1993 年 5 月)，27% (1994 年 4 月) 在「千島湖事件」之後支持獨立的比例達到 27.3%²。以上民調數字顯示的意義為，台灣在八、九〇年代是「黨禁」後的民主轉型階段也是「選舉政治」蓬勃的起步階段，是以民主化過程的台灣其民意變動與政治體系轉型應與「政黨競爭」因素有正相關，這應是影響辜汪會談過程與結果、兩岸關係敵對意向與台灣對國際社會態度的「主導變數」。

就上述第 (3) 點，台灣面對外環境制約與回應國際壓力而言，本文建議當面對意識型態壁壘模糊與國際交往熱絡的時代，當今兩岸關係不但是制度與朝代的轉換也應是心態或「世界觀」的過渡與轉型。如果中共的任何作為與建議都從「統戰」與「妖魔化」視之，最後台灣只會得到「預言式的自我實現」，美國前國防部長史勒辛格 (James Schlesinger) 詮釋說：如果美國堅持認定中國是未來的敵人，就可能逼使中國真正成為美國的敵人。在國際社會上，國家間的「敵友識別」是影響彼此互動的基礎。前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以為是敵？是友？往往懸於一念，你當對方是敵人，對方就必定會是敵人；你當對方是朋友，對方就有機會成為堅貞不渝的盟友，如何讓兩岸「為友」而非「為敵」？³ 應是台灣「生存哲學」的課題。就兩岸僵局與潛在衝突焦點的「一中爭議」而言，從九〇年代以來，兩岸互動的「一中爭議」應蘊含「實質意涵」與「象徵意義」的層次之別。依「柔水哲學」觀點，台灣應重「裡子」而虛懸與標榜並「內外有別」的對待「一中原則」，也應把「一中原則」視為象徵意義甚於實質意涵並與時代精神作辯證性互動。

就上述第 (4) 點，台灣所面對「多階雙重對局」權力結構而言，其中有個亞結構 (sub-structure) 即「美中台」三角關係。不論國際

2 Zha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108. 另外，前國大議長錢復表示，一九八八年國內民意調查顯示當時的台獨支持率只有 3%，但是 1997 年 12 月的調查，台獨支持率已經升高到 30%。請參閱 **自由時報**，民國 87 年 3 月 18 日，版 5。

3 陳長文，「兩岸關係的敵乎友乎」，**聯合報**，94 年 8 月 5 日，版 3。

或國內學界，大都從「美中台」三角戰略關係去歸結各個雙邊的結構特色與類型，以區別敵我關係及探討應對行為。然而，本文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擬從「政策學習」與「國家行為模仿」角度來關照「台海衝突論」的議題。政策學習或制度移植自古有之，於今為烈。本文以為「柔水精神」的「順適策略」是「美中台」三方的「最佳策略」。且「中、美」雙方一直在操持「柔水策略」，例如胡錦濤時代的「兩岸未統一的現狀論述」是順應中華民國憲法的前言內涵，至於「入島入心」的對台政策利多，都可見順適柔軟策略的風格；而美國一貫的台海政策與「模糊策略」也是在適應台海狀況的政策柔軟與迴旋彈性。基本上，美國於九〇年代對中共所採的「圍交政策」(congame)是結合「圍堵政策」與「交往政策」的，對此美國學者藍普頓(David Lampton)指出，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連結混雜著合作與競爭。其間難以形成平順關係，但美國對北京仔細的注意與平行的努力使「美中關係」避免掉入死結與敵對⁴。而在國際間，英國媒體指出，前布萊爾(Blair)政府的政策核心是「自由干涉主義」⁵。因此，不論是自由與干涉形成的「自由干涉主義」或圍堵與交往結合成的「圍交政策」或傳統上中共的「和戰兩手策略」，似乎都是一組二律背反(paradox)所結合成的概念與政策，是以台灣對「一中」的實質與象徵意義若有彈性操作，應可算是國際社會的行為模仿或視為「可作不可說」的先例使用。另一方面，辜汪會談後，台灣處於兩岸僵持與公權力「鎖國狀態」，正與「美中台三角」順適策略的彈性精神背道而馳。面對廿一世紀，美國的輿論與政策已有改採「適應中國崛起」的趨勢。基本上「柔水哲學」與此趨勢不謀而合。守勢現實主義指出，國際關係存在社會化學習⁶，國家為了生存會向成功的模範學習以便如何適應國際社會與國際規範。中共作為崛起中的強權，如何在「夥伴」與「對手」關係之間尋求平衡？一直是對美外交的重點。同樣的，小國如何在夥伴與對手之間作抉擇？如何與大國相處？如何避免「夥伴關係」走向「敵對關係」？如何避免走上「妖魔化中國」的「自我實現」悲劇？這些應是兩岸談判策略與兩岸關係方面，台灣一方所應關注的。

就圖 7-1-1 的(二)不對稱談判態勢之圖例而言，就台灣面對「不對稱權力結構」的「生存之道」，本文第五章提出「一中緩解」的主張是：(1) 模糊策略或模糊精神的應用、(2) 一中爭議的淡化與彈性化、(3) 禮貌性與象徵性的接受一中原則、(4) 彼此面對並接受政治現實、

4 Lampton, "Why the Taiwan Issue Is so Ddangerous."

5 中國時報，96年7月23日，版4。

6 劉慧華，「轉型世界中的中美合作」，請參閱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9409>.

(5) 集體心態的轉變與原則的柔性化、(6) 分裂分治概念的隱性化與非公開化、(7) 一中的各取所需與和平協議建立、(8) 瞭解與尊重對方的國家利益等等。承此精神，本文的第六章指出，台灣的理想型兩岸談判模式或態度應該是：承認「control 弱」(Habeb 的理論意涵)；堅持模糊性與象徵性的「一中承諾」(commitment)；進而爭取「備選方案」(alternative) 或「議題空間」的相對寬廣。該「議題空間」應是滿足中共經濟發展戰略與台灣產業瓶頸升級之所必需，並且同時滿足各自的政治穩定與發展。由於兩岸關係的深層政治意涵存在價值衝突，是以表現在辜汪會談或其他事務談判的爭議性以及雙方會談的不易達成協議。例如「一中爭議」、「法律管轄權爭議」、「對等政治實體爭議」等等主權價值的爭議與爭端。本文以為兩岸研究的「不對稱概念」是首要的，從而決定與對應台海雙方彼此的行為模式與政策主張。就台灣而言，不對稱概念的本質在探討國家屬性「生存哲學」的價值信念與主張以及趨吉避凶的政策趨勢。然而，此種生存哲學是政策立場與意識型態的「上位概念」(beyond the lines)。它表現為政治系統的集體心態模式與國際社會的處世態度。當國際社會充滿「台海戰爭論」則「不對稱的柔水哲學」應是兩岸衝突緩解的理性主張與選擇。這是從九〇年代以來緊張的台海形勢所作的時代反省與主張。台海兩岸「強、弱國」與「大、小國」的權力不對等政治生態，導致本文的研究傾向於弱勢國「生存哲學」的探索意涵。弱勢國家的「生存哲學」往往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先求「裡子」再求「面子」；先求「實質意涵」更甚於「象徵意義」。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摧」，處「不對稱態勢」下的小國，若一味以挑戰強權為能事是所謂「兵凶戰危」之舉。另一方面，惟有理念突破才可能導致政策突破；政策突破之後，新架構才有可能建立。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以為，中國是大國，台灣是小國而且正在它的旁邊。小國無法滿足大國要求時，首先必須態度誠懇說明我們做不到的困難，說明大國的要求不一定對雙方有利，而不須以敵視的態度來反應。大國的做法有時會比較不講理，做為小國的必須要有耐心，受點委屈也要忍受。這是台灣與中國互動時應秉持的原則。讓大國能夠相信台灣的對應是真誠的，這是台海雙方互動良好的前提⁷。基本上，本文探討台灣面對「崛起中國」的相處之道，不同於「整合論」的聯邦、邦聯或其他制度性的兩岸終極安排，也不同於經濟整合之後外溢其效果於政治整合的「歐盟經驗」。本文強調基於兩岸的「不對稱權力」結構，相對小國的台灣應調整兩岸關係的對應心態與國家行為。此項「唯心主義」之論點與建議是總結兩岸關係自九〇年代以來的「僵持無解」、「各說各話」、「互不信任」、「相互指責」與「毫無交集」所提出的緩解。基於「柔水哲學」

7 林義雄，中國時報，民國 94 年 5 月 28 日，時論廣場。

與「反者道之動」的觀點，本文認為「與大國較勁」、「擴大國際空間」的行動與主張是蘊釀與引爆台海軍事衝突的根源。然而，本文立論並非以犧牲台灣尊嚴為成本（cost），反而是在協議式平等的基礎上與近鄰的「崛起中國」在既有的國際結構脈絡中，依國際社會體制（regime）作互惠與互利的交往，這應是擴大台灣生存利基與消弭台海戰爭陰影的根本之道。正如來台訪問的前愛爾蘭總理費茲傑羅（FitzGerald）所說：小國要學習與大國的相處之道。

辜汪會談只是兩岸關係互動史的一頁。在歷史進程中，歷史的客觀規律並不以人類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然而，在人類主觀能動的進化史與文明演進中，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是與客觀的歷史發展作辯證性的互動與彼此建構。兩岸「一中爭議」的終極解決與演化過程，必然受馬克斯式（quasi-Marxism）「歷史決定論」所制約。事實上，「一中爭議」緣起與蘊釀於兩岸之間的歷史恩怨、不同的歷史演化背景與雙方領導人錯失「歷史機遇期」。然而，歷史的演化巨輪有其自身的邏輯與理性，故黑格爾（Hegel）說：理性必定存在，存在必定理性。但歷史演進的結果必然是人類主觀能動性與客觀歷史事件，在辯證性結合基礎上的產出（outcome）。因此，「一中爭議」的不理性成份與內涵必然逐漸消弭與磨合於動態歷史的演進過程，並透過「正、反、和」的辯證方式給出結果。在此過程中「歷史事件」與「歷史產出」必然不斷的進進出出與生成轉化。人類或國家社會一方面是歷史意識的客觀載體（bearing），一方面也是決定歷史演進方向的主導變數。前者造就「一中爭議」的現時僵固性，後者卻逐漸鬆動「一中爭議」的盤根錯節而走向緩解，並且兩者同時發生與並行演進。雖然「一中爭議」有其內在成因。族群對立、兩岸危機都是基於同一根源，是歷史對話的嚴重缺乏造成歷史認識的嚴重扭曲，最後導致歷史選擇的嚴重僵化。台灣對中國歷史應深刻認識正如中國應對台灣歷史作深刻認識，這都是兩岸正面交往的必要條件⁸。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歷史要件的主客觀因素、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偶然性的內在邏輯、歷史事件與歷史產出，都將鋪陳一定（specific）的「歷史結構」。而「一中爭議」也必定鑲嵌在此結構中並具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特色。另一方面，本文的「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在客觀上也符於歷史發展的規律。不論古今中外，凡國內政權更迭或國際間的霸權興衰，大都以武力取天下，然民主與和平氛圍氾張的今日，知強制策略（coercive strategy）之難為，則柔性策略或軟權力（soft power）則成為人與人或國與國的互動基石與參考架構。

8 郭正亮，**變天與挑戰**，初版（台北：天下遠見，民國 89 年），頁 173。

第二節 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的理念闡述

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希望藉由集體心態 (mindset) 與新世紀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attitude) 調整帶來政策的再定位以平息「台海衝突論」的潛在性。一個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的台海應是「美中台」三方的主流民意與官方價值之所在，也是三方互可接受的定位與均衡點。在此均衡點上，台灣不挑戰中國的核心價值與國家利益，則「美中」兩國可望減少在危機處理下，驟然以犧牲台灣利益或尊嚴為處理代價 (cost)。因此，這是台灣面對外在「美中台」權力結構中，相對弱小國的生存與發展之道。這是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及其相繫屬 (connect) 的「柔性策略」、「彈性策略」所想表達的主張與信念。「柔水哲學」不管在議題協議與討論、兩岸關係改善或行為權力的行使與運用，都是弱小國的最佳策略與理性選擇。不對稱權力結構兩岸談判理論 (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 或「處弱哲學」或「柔水哲學」，基本上，是「強弱易勢」下「以敵為師」的想法。早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當時弱小的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對於國民黨所提「服從政府領導並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的要求」，周恩來就認為「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是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是存在」。由此可知中共談判策略先求「裡子」再求「面子」的特性。柔水哲學/Habeeb 理論的精義也可對照「裡子」與「面子」的思辨性。弱勢國家的「生存哲學」往往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先求「裡子」再求「面子」；先求「實質意涵」更甚「象徵意義」。

Habeeb 理論的問題意識指出：大國必須分散注意力在整個國際系統，這給弱方帶來較有利的互動條件。中共當今的「全球戰略思維」視「台灣問題」只是中共全球外交政策及整體國家發展戰略的一環。相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發展之於其他議題的優先性，中共的注意力與力量仍有被其他議題與危機所稀釋與牽制的可能。另外 Habeeb 的不對稱談判理論的理論限制，要求相關各造 (parties) 的關係即使並非聯盟也要有友好關係。從這理論限制產生重要發現亦即小國家之所以能發揮大影響或能跳脫「弱肉強食」宿命，其關鍵在於談判國兩造維繫著「友好關係」至少是「非敵對關係」。否則強大國訴諸權力邏輯與「叢林法則」的非談判方式解決彼此爭端，弱小國將不可能在互動中達成任何政策目標。因此，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若非聯盟關係至少也要有「非敵對關係」，是較能增進台灣的國家利益，進而維持台海局勢與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

定。

本文「柔水哲學 / Habeeb理論」主張，在日趨「全球化」的國際既定結構上，國際結構的存在具有「風險控管」的屏障作用⁹。台灣要應用軟權力（soft power）或「柔性策略」來達成政策目標或求生存與發展。然而，在「內外在外」掣肘因素下，其間的關鍵障礙應屬台灣島內的整合過程。這有賴台灣政治生態的進一步民主深化與政治文化的逐漸改善與變遷，才能走出台海危機的陰影與化解兩岸的潛在衝突。台灣在進入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應增加「軟性權力」的概念使用，透過雙方交流、規範互構與文化認同的主觀建構，型塑與促進台海和平形勢，以符時代潮流與台灣最大福祉。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指出，大陸已靠「軟權力」在擴大影響，台灣應有信心去和它的「軟權力」交往¹⁰。

不論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中共經常宣稱對台的「平等與尊重」立場。雖說崛起的大國有其「霸權」的一面，然而這是台灣必須去瞭解「大國」想法（thinking）的地方，亦即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所說「小國事大國」要注意的地方¹¹，也是小國要去瞭解大國心態（attitude）與價值觀（value）的地方。如果小國昧於客觀的「不對稱權力結構」，一味膨脹國家尊嚴與突出盲目型的自主性，則「小國之堅，大國之摧」是極化發展的合理推論。另一方面，在兩岸互動或兩岸僵局的緩解提議中，每每有人提及「歐盟經驗」是兩岸問題的良好解決方案與榜樣。然而世人似乎淡忘「歐盟經驗」乃是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使歐洲人收斂民族主義的擴張性與排斥性，改採「主權分享論」與「主權有限論」有以致之。但如果台灣的選民結構與民選菁英仍以冷戰的敵對思維使台灣現況往「獨武象限」（圖 4-4-4）移動，自是提高台海軍事危機的機率。就中國而言，中共在「十六大」仍強調發展經濟的戰略優先性，故台灣只要在大陸政策上拿捏得當，台海和平並非不可得。美國智庫學者指出，台海兩岸若發生軍事衝突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台北或難寄望「唯仁者以大事小」而更應著力於「唯智者以小事大」，既要有所堅持

9 張五岳，「兩岸公權力對話與協商：何時？為何？如何」，交流（台北），第92期（民國95年8月），頁35。

10 「自我扭曲使眼光變短淺」，中國時報，民國94年5月16日，時論廣場。

11 林義雄，中國時報，民國94年5月28日，時論廣場。

也要保持彈性與創意¹²。

當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與冷戰的結束，象徵今日是政策變革與突破的年代。基本上，惟有理念突破才可能導致政策更張，政策突破之後，新架構才可能建立。就政策基礎的民意而言，台灣的普遍民意大多趨近廣義的維持現狀，在交流與安全上也認為兩者皆重要¹³。因此，九〇年代以來，台海情勢的嚴峻與兩岸公權力的近乎「鎖國政策」，應是偏離主流民意與整體國家利益。國家應重視與他國的互動關係並在他國追求利益的限制下追求本身利益，尤其強調政策之間的互賴¹⁴。前陸委會副主委高孔廉也指出，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政府的過度干預與限制等於「鎖國」。因為「小對大」的限制並不能達到「大對小」的制裁效果，反而處處自我設限喪失先機¹⁵。如果中共的崛起不可阻擋，台灣保持靈活政策就很重要。例如美國因應中共崛起的作法是，參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以獲取成長利益，同時將中共納入國際經貿的體系規範。對台灣而言，經濟上應與美國共同參與大陸的發展；軍事上應維持一定自主性，以免美國無力控制中共在台海的軍事行動時喪失應變本錢¹⁶。

既然美國的中國政策三大支柱之一是「兩岸加強對話」¹⁷，而中共在「十五大」也有促進兩岸協商談判的政策呼籲。因此，基於「柔水之順適精神」則在此兩大強國的政策交集上，台灣應順此結構趨勢與政策方向以拓展生存與發展空間。在對內層次（domestic level）上，台灣關於兩岸談判或兩岸關係的意見整合，依順適的彈性作法可將兩岸談判的爭議性提案與議題使之「公民投票化」與「公共選擇化」，亦即公權

12 James R. Lilley & Chuck Downs 編；張同瑩等譯，**台灣有沒有明天？**

台海危機美中台關係揭密，初版（台北：先覺，民國 88 年），頁 34。

1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的民意調查與分析結果報告。請參閱

<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s/880511/po8805.htm>。

14 盧業中，「論國際關係理論之新自由制度主義」，**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1 卷第 2 期（民國 91 年 3 月），頁 44。

15 高孔廉，「政府封殺兩岸經貿」，**聯合報**，民國 95 年 7 月 27 日，版 6。

16 蔡政修，「五二〇後的兩岸關係結構與兩岸政治談判前景」，**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2 卷第 1 期（民國 92 年 1 月），頁 75。

17 包宗和，「評亞太經合會柯江會晤後的兩岸關係」，**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 25 卷第 9 期（民國 88 年 9 月），短評。

力施政意志與民意偏好互為辯證與相互證成。但吳秀光教授指出，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有時反倒成為台北向北京爭取較佳談判條件的藉口與籌碼¹⁸。包宗和教授指出，由於現實環境使然，台灣必須承認自己是小國而非大國。台灣應扮演國際的「合作者」而非「麻煩製造者」¹⁹。對中共而言，為順利解決「臺灣問題」以和平談判方式當然優於武力解放。所以，為生存空間維護，為避免戰端禍害，兩岸進行對話與談判正是雙方的最佳政策選擇²⁰。兩岸談判是兩岸和解的象徵。務實而言，談判將是兩岸之間最佳的互動模式。兩岸倘欲追求和解與合作固然要談判；兩岸即使要進行對抗亦可「以談判代替對抗」。這是以「談判」來預防與處理兩岸的衝突性，這是一反過去那種以「停止溝通」來處理與反應兩岸衝突的作法²¹。

自八〇年代，台海兩岸「開放探親」接觸而進入「政冷經熱」的互動格局。這標誌兩岸關係的獨特風貌與潛在的衝突根源。九〇年代以來的兩岸關係發展也打破功能論(functionalism)的學理主張，它從「歐盟」成功經驗推論「分裂國家」藉由經濟整合將走向政治整合。宋國誠教授指出，冷戰後的現勢已無意識型態顧慮，在國際多元化的政治環境中，與中共政治迥異的國家，因自身利益而與中共合作者比比皆是〈美國亦然〉。既然臺灣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上具有重要性，就臺灣而言，不宜在立場上太過偏美而應保持自身的政策彈性、主動性與自主性，在中、美之間尋求空間為自身利益尋求最大利基，亦即在「實質利益」和「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²²。是以，不應將自身立場設限，因為現今被動的做法〈以美國馬首是瞻〉，如果一旦美、中情勢生變，台灣將可能成為美國利益下的犧牲者²³。趙建民教授及許志嘉教授皆表示，中國

18 吳秀光，「兩岸談判不是美式足球」，**聯合報**，民國 87 年 2 月 15 日，版 6。

19 包宗和，「評亞太經合會柯江會晤後的兩岸關係」，**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 25 卷第 9 期(民國 88 年 9 月)，短評。

20 包宗和教授談兩岸談判與台灣外交，請參閱，**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6 月 21 日，版 3。

21 同上註。

22 宋國誠，「中華民國大陸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35 卷第 1 期(民國 81 年 1 月)，頁 16。

23 **中國時報**，民國 92 年 3 月 9 日，社論。

已成功的孤立台灣並威脅其生存，台灣須更具彈性的去適應及參與中國而非對抗²⁴。

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取決於國家和集團間的政治關係而非實力差距。而政治關係又主要取決於意圖（intention），一國對於世界是否構成威脅，關鍵不在國力是否強大而在於它奉行什麼樣的政策。換言之，對國際安全威嚇的主要根源並不是國家間軍事實力差距，而是一國是否有稱霸、擴張、侵略及干涉他國事務的動機與意圖²⁵。朱雲漢教授以為，在歷史上，帶動國際安全秩序轉變的根本因素，並非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有形國力之消長；更根本的原因來自於對「敵友」識別的轉換。過去冷戰體系的崩解，不是由於東西陣營軍事實力出現戲劇性消長，而是安全威脅認知的全面調整。例如歐盟內部重要成員國已達成共識，預定在 94 年度取消對中國大陸武器禁運。促成「歐盟」武器禁運的轉折，軍火貿易的商業誘因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中國崛起」究竟是構成「戰略機遇」？還是威脅？對這問題的認知，歐盟逐漸形成與「華府」截然不同的判斷²⁶。目前國際局勢在相互保證毀滅「恐怖平衡」下，二戰後的國際衝突率皆以「非戰爭手段」解決彼此爭端。前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指出新世紀的中共對台政策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藉由經濟發展、外交封鎖、睦鄰以自重等諸多政策手段達到政策目標。至於台灣如何應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課題，應是「伐謀」、「伐交」以及「如何把敵國變成友邦」²⁷。

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迫切需要塑造新的「世界觀」。也唯有誠實以對才能善用中國以及面對中國壓力，最後達到不畏中國，跑在中國前面而不籠罩在其陰影之下。若信心不足只會讓台灣逐漸落入「保護主義」陷阱而不自知。信心不足或繼續徘徊只會錯失良機並擴大台灣內部的政商矛盾²⁸。立法院長王金平指出，當台灣內部還在為國家定位爭議之際，

24 Edward Friedman, *China's Rise, Taiwan's Dilemma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52.

25 蕭朝琴，「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 25 卷第 10 期（民國 88 年 10 月），頁 47。

26 *中國時報*，民國 94 年 1 月 17 日，版 6。

27 「如何能把敵國變成友邦」，*中國時報*，民國 93 年 12 月 2 日，版 4。

28 洪財隆，「從經續會談台灣經濟發展戰略」，*交流*（台北），第 92 期（民國 95 年 8 月），頁 13。

外在的歷史並沒有停止向前，台灣周遭的東南亞已邁入政經整合，而東北亞進一步經濟整合議題也已端上檯面，未來這兩個區域的政經整合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中國大陸²⁹。面對中國的崛起，大陸將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上逐漸增加對世界甚至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再加上其理性化與治國能力的提升，都將增加台灣所面對的壓力。事實上，中國的週邊國家要如何與必然崛起的中國共處？幾乎所有周邊國家均已和中國修好，沒有與中國對抗的「意圖」³⁰。如果在交流與合作格局下，兩岸許多目前無法推動的和平談判都將易於實現，包括全面停止外交抗爭、安排兩岸領導人互訪、大陸支持台灣加入國際金融及經濟機構等，都不難通過談判逐步實現。如今上百萬台商能在中國經商賺錢，除擁有資金、技術與專業外，最大利器恐怕是「同文同種」所帶來的優勢。台灣必須善用並充分發揮這有利條件而非處心積慮「去中國化」³¹。蔡東杰教授以為，台灣既需大陸市場解決產業升級瓶頸，而大陸也需要台海穩定以完成與鞏固「週邊外交」的政策目標。因此，雙方如能理性的回到現實利益立場，放棄不必要的意識形態束縛與對抗，兩岸關係正常化與和緩也不是那麼難³²。

美國學者指出，促使兩岸關係惡化的因素存在「強烈的台灣認同」以及對「外來者」的懼怕。這些因素是民進黨政府帶領「台獨」走向的心理基礎。「認同議題」和「畏懼中國」使民進黨政府反對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³³。國外媒體指出，在亞洲冷戰（Cold War）仍凍結著台灣海峽³⁴。台海戰爭有可能因誤判而爆發大規模傷亡³⁵。澳洲學者以為

29 立法院長王金平談新世紀的台灣定位，請參閱

<http://news.yam.com/chinatimes/news/200408/20040816032948.html>.

30 包淳亮評論大前研一的「中國出租中」，請參閱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dajungli/Article-60.htm>.

31 傅建中，「中國威脅論與台灣自處之道」，**中國時報**，民國94年6月30日，版6。

32 「新世紀兩岸關係的互補性」，**聯合報**，民國91年1月7日，版3。

33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416.

34 Ross Terrill, "Beijing vs. Taipei," *The National's Foremost Weekly*, August 23, 1999.

35 Yun-Han Chu, Chih-Cgeng Lo and Ramon H. Myers,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兩岸問題的終極解決須要台海雙方更多的「互信」與「讓步」³⁶。依Habeeb的理論邏輯及本文觀點，兩岸若能維持「非敵對」或「友好」關係，將有利於兩岸間的互信建立與相關協議的達成。相反的，中共的軍事威脅與作戰原則一向講究：有理、有利、有節。所以，台灣應避免製造使中共武力進犯的藉口，而使中共師出無名。這是維護台海安全的基本原則³⁷。事實上，兩岸關係或雙邊交流如貨物、貨幣、服務與人力自由流動都可能代表雙邊的危機與機會³⁸。兩岸的關係既是互利的，同時也是潛在的危險³⁹。兩岸交流與交往意味某種程度的兩岸整合，但整合不應理解為民族國家單向的主權犧牲，而係民族國家之間交互影響的連屬關係。藉由此交往與互動的過程，突顯「整合體」及參與國之間的互需與互依性⁴⁰。

在新世紀之際，中國相信新的現實世界政治需要一些不同於冷戰時期管理「國與國」之間的規範與原則⁴¹。目前的兩岸關係，「台灣問題」主要是中共全球外交事務的一環，台灣應放棄兩岸關係「雙人零和對局」思維，走出「國共對峙」的內戰心態，重建「後冷戰時代」以談判或交流為基礎的兩岸關係或政策。美國學者在討論「不對稱衝突」理論時指出，在傳統智慧中，擁有相對廣大資源的強者勢必戰勝弱者，然而這種策略互動的結果往往是因強者以直接（direct）方式對付弱者，而弱者亦以直接方式回應之，才有以致之。如果強弱間的互動是以直接對間接（indirect）或間接對直接，則弱者超越傳統智慧而取勝是有可能的，只是勝負標準不能以傳統標準衡量。在不對稱情況下的弱者，若能「全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6.

36 Gary Klintworth, "China and Taiwan- From Flashpoint to Redefining One China,"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Research Paper, No. 15 2000-01.

37 丁渝洲，*丁渝洲回憶錄*，初版（台北：天下文化，民國93年），頁472。

38 Barry J. Naughton and Dali L. Yang.,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in the Post-Deng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04.

39 Bush, *Untying the Knot*, p. 416.

40 朱錦鵬，「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42卷第8期（民國88年8月），頁71。

41 郭正亮，*變天與挑戰*，頁171。

身」或多得政策目標則可謂勝矣⁴²，此應即是談判理論所謂的「見好就收」。本文「柔水哲學」也可視為此種「間接路線」理論的詮釋，不以直接方式與強大國衝撞，從「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到「2003年春節包機」⁴³都充份表彰此種弱者「以小事大」的理性與彈性作風。當弱者與強者競局之際，在這互動過程有些策略是有利於弱者的，有些是有利於強者的⁴⁴。在「不對稱權力結構」的兩岸競局中，相信「柔性策略」是有利台灣生存與發展的理性選擇以及緩解台海緊張的選項。

美國學者指出，面對「和戰」的挑戰及各種情勢應藉由追求「主動權」(initiatives)，台灣應可將不穩定的危險情勢減至最低⁴⁵。柔水哲學/Habeeb理論並不意味消極與被動，它也可主動追求與建構政策目標。只是在「不對稱」情勢下，以彈性的心態與政策去適應客觀環境。事實上，台灣若能在兩岸政治面扮演積極角色，將有助台灣未來前途。過去，海峽兩岸各自極端、封閉與對峙的政權形成意識型態之爭。長期以來，台灣受反共教育使思想與言行過於「右傾」；至於對岸剛好相反，形成兩種極端對比。由於長期隔閡，使台灣很難掌握中共的想法與價值觀。一個正常的國家或社會必須具備全面性的意識型態係不可或缺的。兩岸對峙使台灣不容許共產黨存在，至於對岸亦同樣情況。然而，法國與日本不乏右翼與左翼政黨同時存在，左翼共產黨應不會帶給法國或日本社會多大的動盪與不安。反而，共產黨意識型態帶給法國與日本社會的多元價值與代表性。是以推斷兩岸之間右翼與左翼政黨的整合才真正代表完整的國家。對於共產黨意識型態不應引以為懼。其實，兩岸若開始正常交往，雙方就不會武力相向，此為合理想法。為展開未來的兩岸新機運，台灣角色似應重新定位⁴⁶。

42 Arreguin-Toft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

43 章孝嚴，*春來燕歸：揭露 2003 春節包機始末*，初版（台北：時周，民國 93 年），頁 164。

44 Ivan, *How the Weak Win War*, p. 34.

45 David A. Shlapak, David T.Orletsky, Barry Wilson, "Dire Strait?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in 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217.

46 「海峽兩岸互動與互變關係之研究」，請參閱 <http://www.gina.nat.gov.tw/rdec1/agent/D-P/d00000114-tpa-admn/node3/rule1/12.htm-82k>.

第三節 理論主張的驗證

本文提出的理論主張為：(一) 在兩岸「不對稱權力結構」下，台灣唯有採取「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較易取得「最大國家利益」；(二) 此種「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是理性的主張與立場，是小國台灣為求生存與發展之所必須；(三) 此種「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的主張與立場並不尋求與中共的核心利益正面衝突，進而保障人民的最大福祉；(四) 此種「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立場，能有效緩解「不對稱權力」下的台海對峙與危機，求取「中國、台灣」雙贏以及與美國等三方面之互可接受的定位與均衡。以上的理論主張其深層意義仍是對「一中爭議」的反應、反思與建議。「一中爭議」其中有個面向可能觸及談判學理所謂的「面子問題」。西方學者表示，「面子」問題充斥整個中國社會與文化⁴⁷。即使國際間的大國與小國談判，有時「保住面子」或「找下台階」也成為政策目標或談判過程之標的 (objective)⁴⁸。從九〇年代以來，兩岸互動的「一中爭議」應該蘊含「實質意涵」與「象徵意義」的層次之別。江澤民時代的「促談、促統」可視作，中共對「一中」的立場較傾向「實質意涵」甚於「象徵意義」，然而「在一中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似乎又把「一中」當作「象徵意義」高懸而敦促雙方協談所關心的實質議題。尤其到了胡錦濤時代「防獨甚於促統」，則中共對於「一中」立場，已傾向或偏重「民族主義」意義的「象徵符號」。並且中共的外交原則一向是基本原則得到維護後，北京可能顯出靈活性⁴⁹。這都有助於台灣與中共互動的政策操作空間。如果台灣更在和平象徵符號的「一中原則」上挑戰其立場，則中共在「法律戰」的旗幟下是有可能轉變「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的反應，以平衡內外

47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215.

48 例如 1968 年，美國與西班牙的「軍事基地」談判，雙方也由於總體力量與議題權力的相差懸殊而使談判僵局面臨結束的下場，最後 Aguirre de Carcer 提出非軍事領域的雙方合作架構，終於使西班牙保住面子而美國繼續使用軍事基地。見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p. 90.

49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初版（北市：月旦，民國 88 年），頁 197。

輸入項 (input) 的嚴重失衡。在這前提下，則順適彈性的「柔性策略」應是台灣的最佳選項 (best option) 以避免與大國作「硬權力」衝突。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決定相互依賴的經濟與政治型態。台灣也許只是小國但在經濟方面則不然。美國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強調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僅是「象徵性意義」。如果雙方能和平解決紛爭，海峽兩岸的關係將會更好，至少在經濟方面是如此⁵⁰。因此在「象徵意義」的「一中」立場之認同與建構，不挑戰大國的核心利益也兼顧台灣的安全、經濟與尊嚴，應成為台灣最佳的選項。另一方面，挑戰台海穩定的台灣內部勢力與言論是台灣「國內因素」的整合問題，只有擴大內部共識與深化民主一途了。

然而，自九〇年代以來，台海僵局與雙方的「隔海放話」似乎使雙方錯失許多機會以化解誤判 (mis-calculation) 與互不信任的兩岸結構，包括中共可能誤解 (mis-understanding) 李登輝總統反對「一國兩制」模式，以及在公元兩千年拒絕與台灣當局重啟兩岸對話。兩岸是有可能錯失許多「歷史機遇期」以化解嚴峻的兩岸關係及管理兩岸的潛在衝突性。展望未來，兩岸需要結合歐美學界有關「後現代」、「全球化」及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等新思維，以及中國傳統對國家分合的歷史觀與經驗，才能創造出既有理論基礎又實際可行的兩岸整合模式⁵¹。總之，在危機與轉機的互動與辯證發展過程中，「柔水哲學 / Habeeb 理論」的指謂意涵，應能有效 (effectiveness) 重啟機會之門 (window of opportunity) 與消弭危機之因 (cause)。就目前台海情勢而言，能為雙方接受並解決兩岸歧見的方案似乎尚不存在，但任何解決之道都有賴兩岸對話來尋找與蘊釀。

基本上，國家宏觀的政治目的與效果總是反應在經濟表現與社會結構上。亞洲開發銀行 (ADB) 於 2007 年發布對各國的最新經濟預測，預估台灣的經濟年成長率在亞洲十一個新興國家敬陪末座⁵²。台灣經濟從以往的高度成長逐漸落於鄰近國家之後，國際競爭力一年比一年退步，原本全球第十四大貿易國下滑至 2006 年的第十六大的局面。國內廠商

50 Peter C. Y. and Chow Westport, *Taiwan in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an Agrarian Economy to an Exporter of High-Tech Products*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 284.

51 宋國誠，「中華民國大陸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的比較評估」，*中國大陸研究* (台北)，第 35 卷第 1 期 (民國 81 年 1 月)，頁 32。

52 「國際機構一致唱衰台灣經濟」，*聯合報*，民國 96 年 1 月 4 日，版 6。

為生存，寧願「以腳投票」揮別土生土長的土地去擁抱新國籍或新身份，只希望不再受政府投資政策的限制⁵³。另一方面，國內學者與媒體呼籲的「族群撕裂」、「民粹政治」的退化以及承受「台海衝突論」的陰影，都讓人感受到台灣為「一中爭議」所付出的代價（cost）。就理性選擇觀點（rational choice），雖說與中共的政治接觸與交往有可能遭致「拒談論者」所謂的「統戰」陷阱與不測風險。然而，若因兩岸關係惡化導致「台海戰爭論」則「交往政策」是更合乎台灣的國家利益。在「不對稱權力結構」台海情勢下，不論是「柔性策略」或「彈性策略」其核心關鍵是不挑戰（not challenge）與衝撞「一中」立場。且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憲法，除非憲法明確修改「一中」立場，否則「一中立場」應受憲法保障，至少在「象徵意義」上是應如此。「一中」是具有穩定兩岸關係的和平意義，進而促進兩岸間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且就台灣社會的人文意義而言，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是「移民社會」的歷史，台灣的歷史過程交替於大國與霸權國定義的「戰略地位」與「邊陲地帶」之間，不論是世界上其他出色的小國，如愛爾蘭或新加坡經驗，或是為了台灣安全與利益計，彈性的「交往政策」都應是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之道。另有實例檢證是，「台海衝突論」核心變數的「一中爭議」，在雙方攻防重點的「國際空間」議題上，事實上，「擴展台灣國際空間」是虛偽性（hypocritical）的政策議題與主張，這立基於兩個理由：（一）八〇年代以前，台灣並未突出「國際空間擴展」但卻開創「台灣奇蹟」。那是個被稱為「務實」與各國建立實質關係的年代；（二）八〇年代之後，台灣力行「拓展國際生存空間」政策，不但被譏為內耗與「銀彈外交」且邦交國卻逐漸減少，並在國際間留下「麻煩製造者」的評價。是以「國際空間」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只是假性需求的政策目標，是附著於「對等政治實體」等「一中爭議」的輔助議題。然而，台灣並非不需要「國際空間」，而是在不與大國衝撞的狀況下，依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的脈絡拓展生存空間。這是八〇年代之前「務實精神」的回復。或是在國際規範下與中共談判協商台灣的國際空間。回顧中國近代史，不論三〇年代，中共的擁護中央政府或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的「務實精神」拓展外交，都符於「柔水哲學」的「避實擊虛」行為模式，也是避開與中共在台灣海峽或外交領域廝殺的「藍海策略」。

53「政客短視近利葬送台灣錢景」，聯合報，民國96年1月4日，版3。